

Security: 新安全论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巴瑞·布赞

Barry Buz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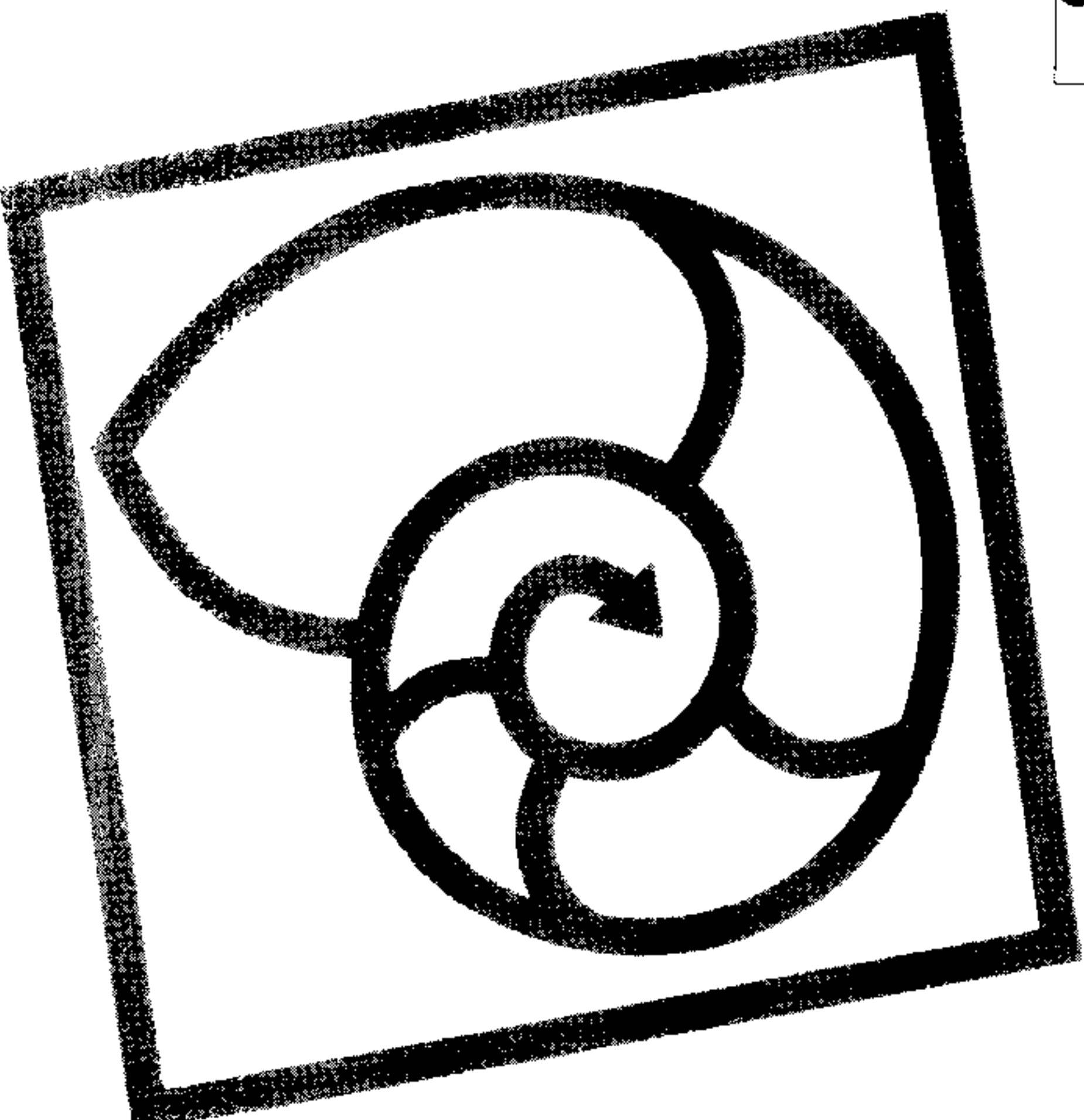
奥利·维夫

Ole Waever

迪·怀尔德 / 著

Jaap De Wilde

朱宁 / 译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1 - 2002 - 0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安全论 / （英）布赞（Buzan，B．），（丹麦）维夫
（Waever，O．），（丹麦）怀尔德（Wilde，J．）主编；朱宁译．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2
（国际关系学当代名著译丛）
书名原文：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ISBN 7 - 213 - 02500 - 7

．新... ．布... 维... 怀... 朱... ．国
家安全 - 研究 ．D8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100779号

Security: A New Frame work for Analysis
Barry Buzan, Ole waever, and Jaap De Wilde Editor
Copyright(c) 1997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c)2002 by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fights reserved

国际关系学当代名著译丛
新 安 全 论

[英] 巴瑞 · 布赞 [丹麦] 奥利 · 维夫 [丹麦] 迪 · 怀尔德 主编 朱 宁 译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毫米 1 / 32
印 张 11 . 75 插 页 2
字 数 27 . 8万 印 数 1 - 5000
版 次 2003年2月第1版
2003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213 - 02500 - 7
定 价 25 . 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巴瑞·布赞 Barry Buzan

伦敦经济学院博士，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丹麦哥本哈根和平研究所(COPRI)项目中心主任。主要著作包括《人民、国家和恐惧》《无政府的逻辑》（合著）等。当今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及安全研究方面的理论泰斗，哥本哈根学派领军人物。

奥利·维夫 Ole Waev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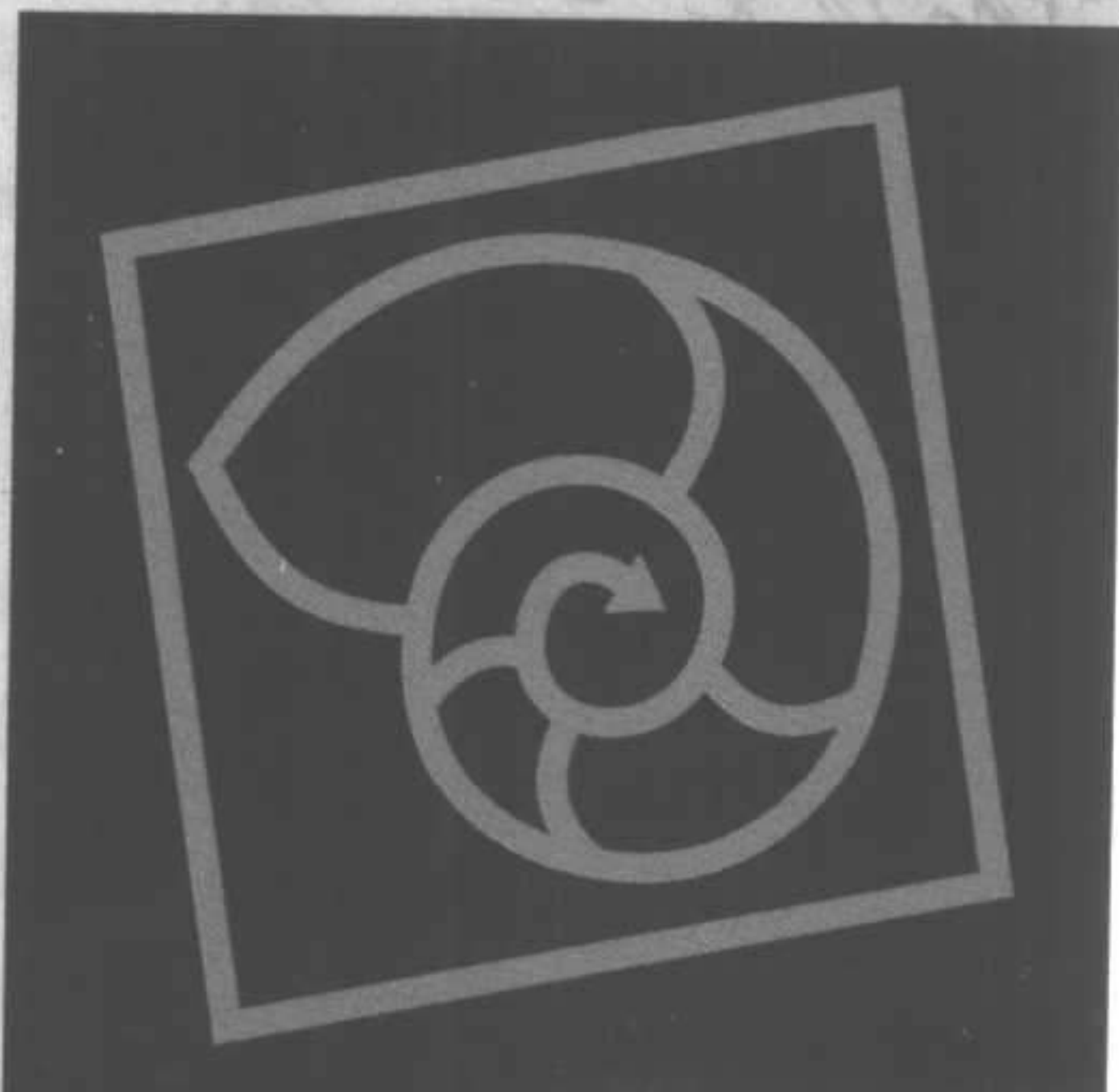
COPRI高级研究员。著有《安全化与非安全化》《认同、移民和欧洲新安全议程》（合著）《地区与强权：国际安全结构》（合著）等。哥本哈根学派及欧美安全研究的中坚人物。

迪·怀尔德 Jaap De Wilde

COPRI项目中心学者。著有《遗忘中的拯救：20世纪上叶的相互依存理论》《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主编）等。

朱 宁

著有《下个世纪谁最强：今后20年中美竞争的地缘政治与战略纲要》（荣获第13届北方15省哲学社科类优秀图书奖）《变乱中的文明：霸权终结与秩序重建》《中国走向选择》（合著）《大国战略：中国利益与使命》（与胡鞍钢等合著）《千年：社会变迁及文明演进》（系列文章）及论文数十篇，各类著述100余万字。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理论，地域战略与中国外交。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





国际关系学
当代名著译丛

编委会名单

主编：王逸舟

编委：王逸舟

王缉思

冯绍雷

江忆恩 [美]

时殷弘

秦亚青

倪世雄



国际关系学
当代名著译丛

王逸舟/主编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无政府状态与世界秩序

主权的终结?
——日趋“缩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

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

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

多边主义

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

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批判

新安全论

- ◎丛书策划/叶国斌
- ◎责任编辑/李子才
- ◎责任校对/鞠朗 戴文英
- ◎封面设计/敬人设计工作室

出版说明

冷战结束后，旧的国际秩序已被打破，但新的秩序尚未形成，21世纪会是什么样的世纪？全球化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但同时又给各国的主权、管理带来了哪些挑战？各国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护自己的利益？知识经济时代国家面临的安全隐患是什么？对所有这些问题西方学者都有自己的思考，都建构起自己的理论体系。他们对时代主题、世界体系、国家主权、民族观念、冲突合作以及交往机制与结构性问题进行了有益的研究。而对这些课题的研究，我国学者尚未有令人满意的答卷，况且对国外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也知之甚少。因此，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我们觉得很有必要做一些引进工作。

从文化视角看，文化是多元的，人类自有历史以来，世界各地独立地发展出富有特色的多种古老文明，如中华文明、古希腊文明、玛雅文明等。多元文化的相互激荡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前经济全球化、世界政治的多极化及当今科技的飞速发展的现实必然会促进文化的交融。纵观世界文化发展史，拒绝接受外来文化，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发展进步都是不可能的，闭关自守、消极保护只能是停滞落后。因此，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我们认定这是很有价值的，也很及时，尤其是中国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后，更需要各国进行文化交流，为我们的经济建设服务。

为了更好地适应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了解最新的国际关系学科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也鉴于国内至今仍然缺少一套以近一二十年国外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前沿课题为介绍对象的译丛，我们认为翻译出版这套书系是很有必要的。

该丛书的主要特色有：第一，全部著作是当代国际政治学界有相当影响的名著；第二，全部著作由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或正在崛起的中生代代表人物撰写；第三，基本上是近一二十年新近出版的作品，国内没有完整地翻译过；第四，选择不同流派、不同主题的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力争呈现不同风格；第五，希冀能满足中国学者、学生的各种阅读兴趣，能成为国际关系专业老师、学生的教学参考书；第六，希望能在中国国际关系学作品出版史上产生历史性影响。

当然，这些作品的作者均来自西方，其观察问题的角度及立场肯定与我们有所不同，有些可能与我们相左。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应学会分析，去除糟粕，汲取精华，为建构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服务。

总 序

王逸舟

在新世纪之初，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引进和出版的“国际关系学当代名著译丛”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里要向读者作些说明，为什么要引进这套书，它有哪些值得一读的地方。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至今已20多年。改革开放不仅使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也使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有了很大改进。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到中国访问和工作，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出国留学或进修；中国的各种出版物和传播媒介对国外情况的介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中国百姓享有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消费品，包括从国外引进的各种物品；人员和物质的往来不断向着新的高度迈进。然而，实事求是地讲，作为一个刚刚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整体发展水平和把握世界的能力仍然是有很大欠缺的，历史上“中央帝国”的某些遗留思想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中国人对当代世界的正确认识。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民众不同，由于经济能力和各种因素的局限，中国仅有很小一个比例的人能够出去看看走走，哪怕其数量比改革开放之前的年代大了不知多少倍。虽然外语学习在年轻一代人中早已蔚然成风，但必须承认，国民中能够用中文以外的文字和语言同外部世界交流和了解前沿知识的人恐怕是世界大国中比重最小的。

上述局面，与中国面临的压力和实际的需要是不相称的：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是核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在

预防地区冲突和消除热点麻烦、防止核扩散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向世界各地蔓延以及改革包括安理会在内的联合国各种职能机构等方面，对国际和平与世界稳定负有极大责任；中国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又是发展中世界成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在能源利用、生态保护、粮食增产、人口控制等方面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影响整个世界相关领域的现状及变化；中国正争取在国际社会拥有充分的和完全的代表权，如力争在国际洋底开发、南极条约改进及太空和平利用等方面有更大的参与机会及发言权。中国是世界一大文明古国，传统文化中某些优良成分至今为世界所称道和使用，如何使之发扬光大，令所谓的“文明冲突论”或“中国威胁论”等预言破产，在未来对中国亦有很大压力和考验。政治的、安全的、经济的、外交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各种因素，都使中国处在一种特殊的“树未大先招风”的情势之下，让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人都无法无视这种局面。如果我们不真正了解世界，不真正了解中国人目前的国际位置和压力，不真正了解中国与世界建立良性互动关系的紧迫性和重要性，那么，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是难于持续的，中国也很难发挥与其幅员、人口、历史相适应的国际作用。

说到了解外部世界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应当说，改革开放这些年来，中国学术界和出版界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结果。最近20年翻译出版的国际关系方面的作品，无论其数量或学派，都远远超过改革开放前的30年。然而，应当看到，这方面的工作仍然很不够。“很不够”的含义之一，是相对经济学、社会学、文学或历史学等学科而言的，在那些学科领域，翻译过来的作品，不仅品种全、数量大，而且传到中国的速度快，例如，一些国际上获奖的作品（如诺贝尔经济学和文学奖得主的作品），几乎立即能够见到中文译本，而国际关系学方面相形之下便差许多。最近20年，特别是冷战结束后这10多年中的一些

有影响的著作仅译出了很小一部分，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等人的著述，而多数在国外有影响、尤其是很有新意的作品则很少见到。与此相关，“很不够”的另一含义，是指已经翻译过来的作品，虽然很有见地，它们仅仅反映了很少几个学派（其中主要是权力政治学派和新现实主义学派）的观点和研究方法，从作用上看主要着眼于外交和国际战略等领域“策论”的需要，而其他学派及研究角度就介绍得很少，尤其是那些对策性不一定很明显、但学术性比较强和注重方法论的理论，如建构主义学派、女性主义学派、生态政治学派、后现代主义学派、批判理论、学习理论和一些交叉性多学科的观点，等等。据我看，后面这些理论学说可能恰恰是中国同行在建立有自身特点和独立视角的工作中应当注意和可以借鉴的。国际关系学之所以被称作“学”，原因恰恰在于其有相对独立的本体论、方法论，有作为通常的国际关系研究之基石的范式与范畴，有关于如何传承思想、鉴别流派、比较对照的系统化知识。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厦的奠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进一步开拓和思路创新，中国在全球安全领域、政治舞台和学术场合之更大建设性作用的发挥，都离不开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与深化，离不开对国际上有关国际关系“学”的各种思考及其成果的吸收。

正是考虑到这种缺失，浙江人民出版社在广泛征求意见和反复斟酌之后，决定在今后若干年时间里，隆重推出“国际关系学当代名著译丛”。为使这套丛书真正成为一个“拳头产品”，丛书延揽了国内外一批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组成了编委会，计划挑选当代国际关系学有代表性的各种学派、理论、思潮和人物，分批分期翻译出版，争取通过一段时期的努力，弥补出版界这方面的空白，使广大读者，特别是关心国际时事和政治的知识人，有更大的阅读选择面，能够比较不同观点和角度的长短优劣，充分地取“他山之石以攻玉”。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也将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和教学工

作提供一套带有“案头书”性质的国际关系作品。此次浙江人民出版社为“国际关系学当代名著译丛”特聘的几位编委，都是目前中国国际政治学界最著名的中青年学者，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望，毫无疑问，他们的加盟是本丛书质量的首要保证。此外，出版社方面还专门聘请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国际政治学家和东亚事务专家江忆恩（Iain Johnston）教授担任本丛书编委，作为保证译著选材的前沿性的重要条件之一。在这些专家编委们的帮助下，浙江人民出版社能够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尽量挑选最有代表性、影响力的作品，使广大读者读到最前沿的思想和方法，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教学事业，进而为创立有中国人自身视角和特色的国际关系学贡献力量。

从编委会和出版社的角度考虑，为了达到上述目标，该丛书的选材、理论深度和学术分量是极其重要的。迄今为止已经出版的两批译著，就是经过反复酝酿斟酌、选了又选，在众多相当出色的作品中，最后被挑选出来的。编委们既充分考虑到中国读者的阅读需求，以求扩大中国国际关系领域的知识来源，也认真征求了国外一些专家的意见，使选中的作品保持前沿性和较高的学术水准。比如，在第一批五本译著中，既有当今世界最有名望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师的代表作（如克莱斯勒的《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也有近些年崭露头角的新锐作者的引起广泛好评的作品（如建构主义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费丽莫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还有收录了当今国际关系学界两大理论流派争论的重要文献、流传十分广泛的一本书（《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从地域特色考虑，以及从读者关注的焦点与兴趣着眼，在第一批作品里，还选择了澳大利亚目前很有影响的两位国际政治学家的主要作品《主权的终结？—日趋“缩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以及华裔美籍著名国际法和国际政治学家熊玠教授的新著《无政府

状态与世界秩序》。在第二批五本译著里，我们第一次选择了欧洲学者的作品，将目前国际上颇有影响的“新安全论”的代表作之一——巴里·布赞等人的《新安全论》——翻译出来推荐给中国读者；在众多的国际关系理论女性主义作品中，选取了重视话语分析和场景分析的力作——克里斯汀·丝维斯特的《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尤其是瞄准近十余年来在美国和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知名度甚高的詹姆斯·德·代元教授，选定其集当代各主要流派之代表作于一体的《国际关系理论批判》一书，将这本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已有相当引征率的著作全部翻译出来；把国际关系学界最早阐述多边主义的专著、美国著名理论家约翰·鲁杰的《多边主义》收入；将目前可能是解析全球国际关系理论学界内“认同意识和文化回归”现象的最出色著作之一、由所谓“第三次争论”的主要发起者和解说者的拉彼德和克拉托赫维尔两位教授编著的《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翻译出版。这两批作品角度各异，方法不一，观点不仅十分前沿，而且呈现出相当的多元性。我们深信，对它们的认真阅读、批判借鉴，将有助于了解国际上有关这一领域的最重要知识，展现国际关系学方兴未艾的多样性和复杂层次，大大开阔一般读者及研究人员的视野和思路。

考虑到目前国内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与世界问题教学的特点，这套书当然有可能成为国内教学和研究人員的主要教学参考书之一。众所周知，最近十几年来，国家教委（现教育部）一直要求所有综合性院校开设“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的课程，各地各院校编写及出版的相关的教科书已有近百本之多。然而，能够作为教学参考书使用的介绍国外国际关系理论及方法的作品却少而又少，而且像前面提到过的那样，仅有的若干外国参考书籍多半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写作和出版的，这种情况自然令国内这方面专业的许多老师和学生感到了教学和研究中的诸多不便。浙江人民出版

社此次考虑出版的系列译著，便充分照顾到这方面的需求；这套丛书不仅要选取最主要的流派及方法论作品，而且将选择并出版一些国外国际关系专业的教材及参考书，尽可能使中国学生的学习视野、信息掌握以及研究方法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同代人保持同步状态。我们相信，在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下，这种愿望最终一定可以实现，“国际关系学当代名著译丛”将能成为一般读者，特别是喜好国际政治问题的青年人的良师益友，长久地驻留在读者们的案头上。

译者序

——安全与非安全化：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

一、安全研究中的学理辩难

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安全研究”（Security Study）是何时出现的呢？虽然有关国家安全的研究与国家一样古老，但是我认为广义的安全研究可以说是二战之后开始的。广义的安全研究大致又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二战至20世纪70年代末，以经典现实主义的“战略研究”为标志；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真正意义上的“安全研究”；冷战结束至今，以社会建构主义高举“非安全化”大旗的安全研究。狭义的“安全研究”则应当看作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出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了国家安全研究的一个“黄金时代”。这一产生于冷战时代的、长达20年的研究浪潮，虽盛极一时，但事实上将它归结为“战略研究”显然更为妥当。在“战略研究”这一古老的研究领域，像《孙子兵法》、《司马兵法》以及到近代《战争论》等等这些著作，仍闪烁着超越那个时代的智慧光芒。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酷烈历史，为“战略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富沃的土壤，由此诞生了像地缘战略论，特别是像马汉“海权论”、麦金德“陆权论”这样“战略研究”的经典。而“战略研究”的巅峰则是60年代的“威慑理论”——这一被学者誉为20世纪国际关系领域最重大、最深奥的

学术创造。

“战略研究”之所以与“安全研究”不同，就在于它所关注的仅仅是国家安全。在它看来安全的惟一指涉对象就是国家，而威胁的形式和手段则来自军事方面。按照史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的理解：“安全”也就是国家安全——被他人的武力所威胁，靠自己的军事力量来保卫。他认为，安全研究是关于战争现象的研究，而且它可被定义为“军事力量的控制和使用、威胁的研究”。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的、可以统称为“战略研究”的安全方面研究，仅仅关注国家安全，其研究目的是利用军事—政治手段如何在战争中保持优胜地位。它认为国家乃安全之器，能确保其疆界范围内人民的安全。安全对于个人，是由他们所属特定国家的公民身份保证的：只要国家安全，公民就安全。

然而国家安全的战略研究并非安全研究。到了20世纪70年代，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以及经济作用的日益凸显，人们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安全研究：什么是安全本质？安全的指涉对象应当是国家还是个体，或者是全球生态系统？国家在提供个人安全的同时，是否也进一步剥夺了个体自由？在军事威胁之外，就无其他任何形式的威胁之虞了吗？这样，有关“安全研究”出现了，而这一切先源于新现实主义。大卫·鲍德温指出：“最重视安全研究的是新现实主义，它认为安全是国家首要动机和目标。”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当人们开始将安全而不是权力当作目的，强调安全的相互依赖而不是仅仅关注自身的安全时，“安全研究”诞生了。

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安全观

准确地说来，安全研究兴起是由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大辩论所催生。

在“安全研究”方面，这两派的主要分歧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国

家合作问题。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最终关心的不是权力而是安全，因此，如果追求更大权力可能冒不安全的风险，国家就可能选择强制而不是战争，这就使得新现实主义与古典现实主义拉开了距离。“权力是一种可能有用的手段，明智的政治家总是力图拥有适度的权力。在重要关头，国家最终所关心的不是权力，而是安全。这是新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的重要修正。” 沃尔兹以后的新现实主义者，如格拉瑟提出，完全可以通过合作性政策而不是竞争性政策来实现他们的安全目标。因为，与其冒竞争之险还不如冒合作之险。这种合作，即使是有限的，但至少能降低“安全困境”。新自由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合作是经常发生和存在的现象。它认为新现实主义低估了国际合作的可能以及国际制度的能力。基欧汉的国际合作理论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国家是有理性的。也就是说国家行为合乎规则，一致且有秩序，并能权衡将要选择行为的得与失，以最大化其实际效用。新自由主义相信，有了制度所提供的协调机制，国家就可以通过交易与权衡使整个合作达到一种稳定结果。在一个受到国家权力和不同利益制约的世界里，发展国家间制度化的合作，可以为实现更大范围的国际安全提供机遇；当国家之间进行合作以获取某些利益时，它们关注的是获益如何分配。在这个问题上，新现实主义强调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相对获益，也就是说计算自己所得是否多于别人所获。而新自由主义则认为国家的目的是获取绝对收益，只考虑在合作中自己是否有所得益，不顾及自己的收益比别人多还是少。

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安全研究方面又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两个学派都承认无政府状态是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首先，无政府状态是给定的因素，客观存在于国际体系之中，是凌驾于体系中行为体之上的无形之手；再则，无政府秩序只有一种逻辑，即霍布斯自然状态的逻辑，也即国际体系必然是一个自助体系

的逻辑。在沃尔兹那里，基本变量只有两个，即国际体系结构与国家行为。其基本的变量关系是国际体系影响国家行为；而基欧汉的基本变量也是两个，即国际制度和国家行为。其基本变量关系是国际制度影响行为。这样经过几次大辩论，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对国际安全的一些重大分歧反而渐渐趋同，都可以归于传统主义安全研究。

批评性安全研究

冷战结束导致了安全研究的第二阶段形成，而序幕是由《国际安全》上发表的两组论文拉开的。约翰·盖迪斯题为《国际关系理论与冷战的结束》一文，将矛头直指新现实主义：为什么自称具有预测功能的国际关系理论未能预测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而约翰·米斯海默的文章《国际制度论的虚假前提》则对新自由制度主义进行发难，他认为，“自由制度主义，未能提供了解国际关系和促进冷战后和平稳定的坚实基础”。随着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在安全研究方面的解释越来越捉襟见肘，被统称为反思主义的非主流派的挑战也显得更加强劲。首先，这些反思主义不承认理性主义的基础，强调理论的诠释性、行为体结构的互构性以及“主体间”意义的重要性。批判理论家罗伯特·考克斯认为：社会结构是主体间互动的结果，是社会建构而成的，主流理论所谓的像国家这样的给定因素实际上是历史和社会力量所建构的。这样一来，对安全的思考在多个层次上以多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着。分析家们提出：第一，什么是或这个该不该是安全的指涉对象？我们是否应当为安全研究与实践确定其他指涉对象？第二，这一指涉对象怎样才算安全？此外，安全的本质也需要重新讨论。

应运而生的“批评性安全研究”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这样的“传统安全研究”提出了质疑，它反对传统安全理论所采取的